



2002.7-2002.12

百年学府

4

3

BEIDA
ZUIJIA
JIANGZUO

2002

第三辑

北大最佳讲座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大在线 主编



2002.7-2002.12

百年学府 讲席文集

4

[2002 北大最佳讲座

北大在线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2 北大最佳讲座. (第 3 辑) / 北大在线主编. —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2

ISBN 7-5012-1990-7

I. 2... II. 北... III. 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1021 号

- | | |
|------|-------------------------------|
| 书 名 | 2002 北大最佳讲座 (第三辑) |
| 责任编辑 | 张光勤 赵凌云 |
| 封面设计 | 亿点工作室 |
| 责任出版 | 夏凤仙 |
| 出版发行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 地址邮编 |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
| 发行电话 | (010) 65265923 (010) 65265928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排版印刷 | 北京星月印刷厂 |
| 开本印张 | 850×1168 1/32 印张: 9.625 |
| 版次印次 | 2003 年 3 月第一版 2003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
| 字 数 | 190 千字 |
| 印 数 | 1-10000 册 |
| 定 价 | 22.00 元 (赠讲座现场光盘一张) |
| 版权声明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学问之道	林毅夫/ 1
经济学科在美国	钱颖一/ 29
理论导向的社会学研究	边燕杰/ 41
当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特点及发展趋势	刘 伟/ 63
中国金融改革新进展	谢 平/ 75
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战略问题	苗 圩/107
当代公共管理与政府改革	周志忍/139
中国选举制度的改革	蔡定剑/153

175/李 强	中国的社会分层
197/戴建中	中国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
219/白威廉	中国人性行为的发展趋势
231/刘金质	布什主义——“9·11”以后的国际环境
263/谢 宇	美国和美国社会
283/奥康娜	维护法制：健全的刑事司法 程序的重要性
295/郑梦准	世界杯与世界和平

林毅夫 学问之道

时间：2002年11月16日

地点：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报告厅

主讲人介绍：林毅夫 台湾宜兰人，1952年出生，著名经济学家。1978年台湾政治大学工商管理硕士，1982年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随后赴美，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198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全国政协委员。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等。

主席、各位同学，晚上好！刚刚主席介绍说我是一个久负盛名的学者，这个我真是担当不起。因为我今年差不多 50 岁，真正开始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是 30 岁，读了 4 年书，又做了一年博士后，回到国内来开始做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前后也不过就是 15 年的时间。这段时间里面我写了一些东西，不过我的学术生涯讲起来还是相当短的。在这种状况之下还称我是久负盛名，如果说有这样的印象的话，应该是虚名啊。

今天晚上跟大家谈谈什么东西好呢？昨天下午的时候我正在开车，突然间接到一个电话，说今天我们研究生的文化节要开幕，要请个学者来做报告。这是一个临时通知，不过我想有机会跟同学们作一次面对面的交流，作为老师，总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一直在想跟各位谈什么比较好，如果是谈经济学方面的一些理论问题，可能会太专一点，而且我现在每个星期五还在讲通选课，我相信也有不少同学在那边听我的课。后来我就想到这是文化节的开始，这次文化节定的题目是“怎么样来实现北京大学在 21 世纪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样的一个课题。我想这个题目定得非常好，因为我个人确实相信北京大学完全有可能在 21 世纪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北京大学现在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我也相信北京大学很有可能，在 21 世纪，经过我们的努力，变成全世界的文化中心之一。

我说我有这个信心，因为大概两个星期以前，在北大开的一个文科论坛，在那个论坛上面我也作了一个报告，讲的题目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文化的贡献》。我个人相信非常有可

能在未来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可以保持平均每年8%左右的增长速度，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可以增长8倍，翻3番，全国的经济规模可能超过美国，变成全世界最大最强的。我们知道，经济是基础，如果经济发展，那么上层建筑，包括社会、文化教育、政治制度也会跟着变，然后思想意识形态、精神面貌也会跟着相适应，这就是江主席提出的所谓“与时俱进”。那么经济加上上层建筑应该成为一个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到底是兴盛还是衰败，其实很大程度决定于经济基础的强弱。

我们现在担心美国文化的侵略，但是各位想想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当时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是英国，那么最有侵略性、最有朝气的文化是英国文化。如果你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跟人家谈美国文化，大家会觉得你是在开玩笑，大家认为美国是一个文化沙漠。但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文化非常有活力。同样的情形，比如说我们在历史上曾经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可以讲，在工业革命以前将近1500多年之间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顶峰，这也是因为我们当时的经济总体规模最大。根据一些研究，一直到18世纪，我们的经济规模在全世界还占着超过四分之一的份额。不仅是这样，而且人均的生活水平也是最高的。因此在那种状况之下，所谓文化无非是我们在当时那个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政治、社会、经济体制，以及我们当时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到21世纪30年代以后，我们会变成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而且我也有理由相信，到

那时候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非常快，我们有稳定增长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会迎来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

那么在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中国也会变成全世界的文化中心。远的就不说，可以讲从工业革命以前，近代开始，世界的学术中心主要是在欧洲，比如当时的德国和法国。慢慢地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英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比欧洲大陆更快，当时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文化中心就逐渐转移到英国。到了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经济的发展得非常快，取代了英国，变成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世界的学术研究中心，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还有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的中心，就逐渐转移到美国。

为什么学术中心的转移会有这种时间上的序列性？主要的原因是任何理论、学术思想，主要是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任何一个理论最主要的内涵是一个逻辑体系，说明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的逻辑体系。在这个逻辑体系当中，从逻辑本身来讲，很难判断贡献的大小。一个思想或是一个学说，它的贡献既然不能从内部来决定，很重要的方式，就要靠它所解释的现象来决定。如果它要解释的现象重要，那么学说的贡献就重要。社会科学是这样子，当然自然科学现象的重要性很难讲怎么来决定，那么自然科学的研究通常需要很大的物质基础来支撑。我们知道自然科学很多研究需要用设备，而且越来越精细。通常是在经济基础越雄厚的国家，可以用来支持这样的科学研究的财力、人力就越多，在这种情

况下，可能取得的成果就越多。在社会科学上面，重要性是决定于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而这又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个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重要性。通常是一个国家在世界当中政治、经济地位越高，解释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现象的理论和重要性就越大，这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就越大。而自然科学我刚才讲了，国家越发达，能够提供的资金就越多，贡献也就越大。

随着 21 世纪中国经济很可能在 30 年代成为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发生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现象对世界的影响也就会越大。很可能研究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在世界的影响也会越大。这种趋势我个人是亲身感受到的。比如说我在 1982 年刚到美国的时候，当时的经济学主要的刊物上面，基本上看不到研究中国经济的文章。如果有的话，大部分是由那些“中国观察家”写的文章，有一点像是我们现在讲的纪实文学，就是搜集资料、描述现象，让人家了解中国，但在理论中没有贡献。这几年来由于中国的改革的速度比较快，经济发展得非常快，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研究中国经济的论文也就有了。这个现象不仅是在经济学上，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方面也一样。所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给我们在世界学术论坛上越来越大的空间，我们支持自然科学研究的实力也越来越强，很可能在 21 世纪，我们会迎来很多中国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代。而且这方面的研究对我们也是必要的，中国在从一个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过渡，

从一个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过渡，这个过渡是非常快速的；而现有的理论基本是从 17、18 世纪开始逐渐形成的，并且是从欧洲的英国到美国去的，都是在当时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发达国家的现象跟我们这个快速变动、转型的国家很多现象是不一样的。如果只拿现有的理论解释我们的现象，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导方针，经常会发生很多错误。

比如说在经济学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苏联、东欧的转型。它们请了世界上当时最有名的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像哈佛大学的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还有 MIT 的教授，参加苏联、东欧改革的政策制定的都是当时现代经济学的大师级人物。我们发现根据他们的建议实行的休克疗法造成了苏联、东欧经济的崩溃。这充分表明现有的理论实际上不能够作为像中国这样快速转型的国家的政策参考。

北大的学生们，我想是负有时代的责任的，这个时代也给了我们一个机遇，也就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会变成一个文化中心，世界的学术中心。那么北大作为中国的学术中心，应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如果中国要出现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北大应该出现得最多。同时反过来，如果中国在 21 世纪未来 20、30、40 年要取得快速的发展，当中当然要克服很多很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不是现有的理论就能拿来用的，需要我们去重新研究、思考、建构。

我在美国的一个老师，大家也可能知道，就是 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舒尔茨。他曾经研究过欧洲近 300 年的历

史，发现大的社会变革通常都有大的社会思潮，这些社会思潮大多是由专家、学者、思想家提出来的，然后作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中国在 21 世纪要完成现代化，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大的历史变革，这提供了许多素材让我们来研究，现有的理论没有涉及过。而且我们也需要对这些问题做深入的了解，提出新的思潮，推动社会的变革。

基于这种认识，而且我在北大教书，也在做研究，这几年我也在经济学的研究上有些心得，在研究的方法上面也有一些认识，就来跟各位谈谈怎么样做学问。

关于做学问，我们的老祖宗孔老夫子在《论语》里讲的话有很多很有道理。比如说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仔细想起来，所有做学术做研究的方法在这两句里面基本上涵盖到了。这两句话我很小就读过，在初中就能背得非常熟了。这些字的表面意义非常清楚，“学”当然是学习了，“思”当然是思考了，但是我发现还有更深的含义。

第一个“思”，“学而不思则罔”的“思”跟“思而不学则殆”的“思”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关于第一个“学”和第一个“思”，我觉得在《中庸》里面有一段话是很好的注解，“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学而不思则罔”的“学”应该是“博学”，而且学的时候要有心地“审问”，纵贯古今，百家千家。但是读的时候还有“审问”，仔细地去思考，每个学说每个理论的假设是什么，推论是什么，分清楚各个学说的应用是什么，这是第一个“学”。

但单单学还不行，还要“思”。孟子曾经讲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并不是所有的理论学说都是最好的，有很多可能是一些糟粕。我个人小时候读科学史的时候发现很多有趣的事，在科学史上，一些当时的真理在现在看来是笑话。比如在科学史上曾经有这么一个记载，人们认为老鼠是怎么产生的呢？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认为只要把一些破布放在床底下的箱子里，几个月以后自然会产生老鼠。这曾经是一个理论，另外很多人也这么做了，的确产生老鼠。可是我们现在知道，老鼠不是从破布里产生的，老鼠是老鼠的爸爸跟妈妈生的。如果我们不去思辨的话，很可能把书上记载的当作是真的。固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有许多学者提出过一些错误的观点，尽管他们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比如亚里士多德，提出自然界是由四个要素组成的，风、火、水、土。亚里士多德在 2000 多年前就能有这样一个想法当然是很不错的，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即使这个说法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世界最伟大的学者、哲学家之一，也是不正确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不能只是“博学”，把现有的东西读过了，了解了，像百科全书记下来了，我们还要仔细地想，到底这个理论是不是对的。通常一个现象可以用一个理论来解释，经常会有很多理论都可以解释这个现象，那我们怎样决定接受一个理论还是不接受一个理论呢？

“思”有两个很主要的意义，一个是我们必须很仔细地了解理论的内部逻辑是不是一致的，因为我们学的目的是要致用，

也就是说学到以后希望能够通过它来帮助社会，甚至是改造社会。如果要了解社会、改造社会就应该知道一些“因”跟“果”的关系，这就要求一个理论的内部逻辑必须是自恰的，只有自恰的逻辑才能说明因跟果的关系。只有自恰的逻辑还不够，还必须是这个理论所有推论跟我们所了解的现象也是一致的。这一点我自己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有体验。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中国的农村改革。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村改革是从计划经济的合作社变成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家庭经营。关于合作社的经济形式，阿马蒂亚·森，也是前几年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做过一个理论模型，如何采取工分制进行生产的模型，在生产队当中农民的工作积极性是怎样，资源配置的状况是怎样？这个理论是一个很严谨的数学模型，逻辑上面绝对没有问题，所以在美国及国外的学术界有很多人接受它，认为它是对的。中国的农村改革从生产队变成家庭联产责任制后，生产力提高得非常多，农民的积极性增长得非常快，可是这个理论模型却说如果一个生产队实行按劳分配的话是有问题的，积极性不高。但我们看国内的现象，了解到以前生产队的时候是所谓“上工一条龙，到地一窝蜂，干活一呼隆”。虽然这个理论模型是由当时最有名的、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提出的，但我们观察到实际上农民工作积极性非常低，理论模型的推论说农民的积极性非常高，是并不符合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我们不假思考就把它接受下来的话，有人会说中国从合作社变成个体经营是搞坏了，在国外相当长时间有不少学术界

是采取这种观点的。只有仔细地思考，而且在思考的时候不仅要看逻辑，同时要看逻辑的推论跟我们今天的事实是不是一致，只有一致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接受。

当某个理论模型跟现象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应该放弃的不是现象，是这个理论模型；如果是一个理论体系很多推论跟现象不一致的时候，我们要重新思考这个理论体系。在这方面我们来研究苏联跟东欧的改革，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我刚才提到苏联、东欧的改革是请哈佛大学跟 MIT 一批最有名的学者帮他们设计的，他们设计的时候当然是根据现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来设计的。但我们发现根据这个理论设计的政策，推行的结果跟原来的预期有很大的不同。开始提出休克疗法的时候，当时的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推行休克疗法以后苏联、东欧的经济会很快恢复，而且当时很多人认为它们的发展速度会比中国的快，因为中国当时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不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来改革的。他们认为中国虽然在 80 年代经济发展上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但是会困难重重。可是我们经过 90 年代，发现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除了一个例外，波兰，其他的国家的国民经济下滑了 30%、40%，而且持续几年高度通货膨胀，到现在经济才恢复。而波兰之所以没有发生很大的挫折，主要的原因是波兰并没有完全按照休克疗法的内容来执行。比如说波兰的企业绝大部分是没有私有化的，而按照休克疗法的全盘私有化、市场化的这些国家都一塌糊涂。

不仅是在苏联、东欧，它们根据现有的经济理论请大师来

制定的这些改革措施遭遇到很大的困难，包括我们在国内根据现在的经济理论制定的很多方案，通常效果不好。1978年的改革到现在，总的来讲经济发展非常好，但发展非常好的那一部分很多不是政府设计出来的。从1978年到90年代当中两个最有效的改革，一个是农村里面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个是乡镇企业，用小平同志讲的话，这是两个意想不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全是意想不到的结果。既然是意想不到的，就不是政府设计的。而政府设计的很多是在国有企业里面，包括利润留存、承包制以及后来的现代企业制度，可以讲教科书上所写的办法除了私有化之外，几乎都用过了，但是我们知道国有企业到现在还是困难重重。跟苏联、东欧一样，按照教科书来改的都没有取得效果。实际上现有的西方经济理论体系可能有基础上的问题。最近我也写过一些文章来探讨这个问题，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现代经济学有很多的假设，比如说理性人的假设、市场竞争的假设等等，当中还有一个假设我把它称为自身能力的假设，也就是如果一个企业正常管理的话，在竞争的市场当中这个企业应该在不需要外力扶持的情况下，达到所预期的效果，这是现代经济学一个大的假设。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假设，前提是这个企业所在的行业、所选择的产品、所用的技术，必须跟经济的比较优势结构一致。如果不一致，即使有好的管理，也是不能实现预期的。在转型中国家，比如我们，可以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而转型中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时候通常直接的需求是因为

经济，因此重工业不是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所以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这些企业如果没有政府的融资就会垮台。由于这个基本前提不一样，采用休克疗法的时候一下子就放开，一下子就想砍掉政府的支持，基本上不行，可是政府又不能够让全部的企业崩溃，因此就没有办法真正地砍断，所谓政企分开等等。在经济学上所讲的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就会继续存在。

所以我想我们做学问，首先要学，要博学，要把现有的理论尽可能地学到，在学的时候也要知道各个理论的前提、假设。但不只是学，如果只是学只是记的话，那么只是像大百科全书。而过去作为一个大百科全书类的学者可能还有一些用途，因为过去理论查找起来非常困难。可是我们知道现在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随着信息手段的丰富，任何理论和书都可以非常容易地得到，比如现在在街上很容易就可以买到一个光盘，里面就有整个《大英百科全书》，像《四库全书》那么大部头的书也不过几个光盘。不仅是这样，现在通过信息手段查找资料也很容易。所以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型、只是学和记或者了解得非常清楚的学者的功用就越来越小了。这样，“思”就非常重要了，我们不仅要学，而且要知道这些学问到底在什么状况下是属于正确的，什么状况下是属于不正确的，哪些理论是要接受的，哪些理论是要放弃的。

学的目的是“温故知新”，这是在《论语》里面所说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知新”呢？我想就是刚才所说的第二句话，“思而不学则殆”。第一个“思”我认为是检查现有的理论的内